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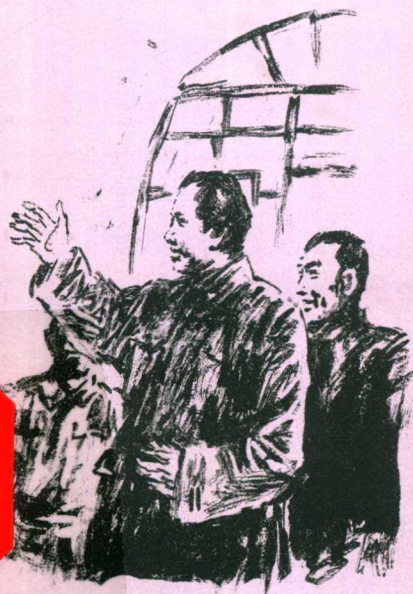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九辑)

总主编/李玉明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山西

张雪琴

著



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山西依靠“牺盟会”、“战动总会”和八路军的密切结合,在帮助阎锡山抗战的过程中,开辟了广大的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并使之成为坚持全国持久战,夺取抗战伟大胜利的中流砥柱。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王灵善
 张建英
复 审:杜厚勤
终 审:张安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山西/张雪琴著. —太原:山西人
民出版社, 2003.8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9辑/李玉明主编)
ISBN 7-203-04867-5

I. 第... II. 张... III. 国共合作-山西省-1936
~1946 IV. K26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8780 号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9辑)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山西

张雪琴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375 字数: 288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套

*

ISBN 7-203-04867-5

K·314 定价: (全套 10 册) 30.00 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 谦 李立功 王庭栋 任继愈

马 烽 姚奠中 申维辰

主任委员：赵雨亭

副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牛崇辉 白云 任茂棠

刘 江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贯文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杨建峰 陈扬炯 陈墨章 张 颌

张国祥 张根玉 张捷夫 罗广德

武丕仁 赵劲夫 赵瑞民 赵曙光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高培湖

陶正刚 柴泽俊 阎广洪 梁豫秦

谢 恺 谢洪涛 楚 刃 雷忠勤

目 录

上篇 “牺盟会”

- 一、“牺盟会”的酝酿和成立 (1)
- 二、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5)
 - (一)党的英明决策和阎锡山转向“联共抗日”
..... (6)
 - (二)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9)
- 三、“牺盟会”的接办、改组和新生 (14)
- 四、“牺盟会”的历史功绩..... (19)

下篇 “战动总会”

- 一、“战动总会”诞生的历史由来..... (23)
- 二、创建“战动总会”主张的提出
及其正式成立 (25)
- 三、“战动总会”的坚持和发展 (31)
 - (一)“战动总会”的坚持和巩固 (31)
 - (二)“战动总会”的发展和壮大 (36)
 - (三)为扩大、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而斗争
..... (40)
- 四、“战动总会”的光辉业绩..... (42)

引 子

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在一个省(以至一个战区)的范围内的伟大胜利,也是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山西(以至一个战区)的成功实践。而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和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则是这一统一战线的两个具体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它们以特有的形式,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组建抗日武装部队,掌握抗日民主政权,为开创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抗战局面,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光辉的业绩,熔铸了不朽的丰碑。

上篇 “牺盟会”

一、“牺盟会”的酝酿和成立

“牺盟会”的成立经历了一个酝酿的过程。实际上,“牺盟会”的成立也是由中国共产党推动与影响的结果。1934年的冬天,这时候,一方面,鉴于“阎锡山同蒋介石有矛盾,想搞自己的一套,他想从共产党那里学点东西对付蒋介石”,并且“想利用两种人达到他的目的:一种,曾是共产党员,现在脱离关系的,特别是叛徒;一种,讲马列主义理论,但不是共产党员的学者。”另一方面,由于“九一八事变后,

国内救亡运动高涨,全国人民都要求组织起来,团结御侮。阎锡山本来是最怕群众运动的,最怕群众团结组织起来的。但是,他看到群众就要起来了,光怕不解决问题,因此,就设法利用群众运动。他说:‘明知组织起来是个乱子,不去组织是个空子,为了防止人家钻了空子,出了乱子,还不如自己去组织,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可以防乱子,补空子,还可利用群众团体为自己摇旗呐喊’”。在这里,充分反映了阎锡山存在着的两种突出心态:一是仇视共产党,但又感到共产党有值得效法之处,极欲搜罗为其所用的人才;二是惧怕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但又觉得它有可利用之处,极力加以组织和掌握。前者,给共产党提供了打入阎锡山内部的便利条件;后者,则说明阎锡山要和共产党争夺群众了。早从1932年开始,阎锡山就将其罪恶的手伸向群众运动,先后组建了“中国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山西人民监政会”、“晋绥人民监政同志会”、“文山读书会”、“植社”等一系列冠冕堂皇的所谓民众团体。然而,声势最大、反动最烈的,莫过于“主张公道团”了。随着陕甘苏区的建立,特别是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防共反共”就更加成为阎锡山日夜思虑的中心课题。因此,阎锡山一面奉蒋介石之命,派兵入陕“进剿”红军;一面组织力量,进行山西境内的“防共”事务。到1936年春,即红军举行东征期间,阎锡山为了集中控制上述各民众团体,以对付东征红军,便将其合并统一,组织建立了“自强救国同志会”。这是阎锡山在新形势下组建的一个政党性的核心组织,由他亲自领导。但“主张公道团”并没有取消,而作为“自强救国同志会”的

外围组织仍保留下来。“自强救国同志会”一出笼,就更加煞有介事,更加具有欺骗性和反动性。阎锡山不仅把“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准备抗敌”等革命词藻规定为“自强救国同志会”的政治纲领,而且还在它的下面分设了青年、工人、民众、妇女、商人等5个委员会,以招摇撞骗,笼络人心。

针对阎锡山的动向和企图,在1934年冬至1936年秋的这一时期中,共产党对阎锡山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派遣上层文化界的秘密党员和进步人士,利用学者身份,采取讲学方式,打入阎锡山统治集团内部,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既做上层人士的工作,又把阎锡山控制的群众团体变成革命的政治讲坛,大力开展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张友渔、邢西萍(徐冰)、侯外庐等一批地下共产党员和左派教授,就是在这种情势下接受党组织的派遣陆续到太原来进行工作的。他们利用特定的“身份”和“方式”,给开展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一面“投阎锡山之所好”,通过讲马列主义理论,比较广泛地接触了阎锡山及其上层集团的人士,以至打入“青年救国团”,成为该团的理论委员会委员;一面又利用“青年救国团”的合法地位,直接在青年中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并创办了“中外语文学会”,出版了《中外论坛》,向社会各界进行了抗日救亡的宣传。这些左派教授,尽管当时还没有能够在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但应当肯定,他们所进行的革命活动,却为共产党进一步了解阎锡山,开展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对人民群众的革命发动起了有益的启蒙作用,为实现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做了初步的酝酿和准备。

红军东征的胜利，大大巩固并发展了左派教授工作的成果，加快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准备进程。由于红军东征的有力推动，不但使广大工农群众受到鼓舞，更加觉醒，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念，而且已经影响到阎锡山集团内部，以至使他的核心组织“自强救国同志会”的多数干部委员也开始转向抗日救亡斗争方面来。这是山西的一个重大政治进步，在这一政治进步中，尤以“自强救国同志会”的青年委员会表现得最为突出。由于青年委员会中已经涌现出一批像杜任之、宋劭文、戎子和、刘玉衡等中坚骨干，而且他们认定阎锡山统治的腐朽反动，毫无前途，所以在1936年六七月间阎锡山召集“自强救国同志会”的干部委员开会研究今后任务时，就当面向阎锡山提出了“联共抗日”的要求和主张。众所周知，对于“抗日”这个口号，阎锡山是下了“禁令”的，从来不准任何人提及，也的确没有人敢在阎锡山面前提出过。如今，在“自强救国同志会”的干部委员会议上，进步青年竟然面对阎锡山公开提出和赞同实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一种新的革命创举开始在进步青年中酝酿起来，这就是筹划成立“牺盟会”的组织。1936年七八月间，主张公道团举办区团长以上干部和部分村团长训练班。主持领导正、副区团长和文书训练工作的“自强救国同志会”的青年委员会与民众委员会中的进步青年杜任之、宋劭文、戎子和、刘玉衡、张文昂、张隽轩、牛佩宗、刘岱峰等集体计议，一致认为：自1931年九一八以来，年年纪念九一八，但总是局限于搞一些空洞的决定，做一些表面的文

章,没有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这是同抗日救亡形势极不相适应的。今年的九一八纪念,是红军东征以后的头一次纪念,能不能一反过去之常态,另开一个新的生面,响应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进行一番实实在在的抗日救亡工作?于是,建立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救国群众组织,便成为他们确定的奋斗目标,并且正式向阎锡山提了出来。想当初,阎锡山企图把“自强救国同志会”完全变成他抗拒东征红军的反革命工具,但随着红军东征的巨大推动和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对山西的严重威逼,使事态发生了新的微妙的变化,它不但促使“自强救国同志会”的多数干部委员开始转向抗日救亡方面来,而且也迫使阎锡山开始产生了从共产党身上寻求新的生路的想法。当杜任之、宋劭文、戎子和、刘玉衡等革命青年向阎锡山提出组建抗日救国群众团的倡议时,阎锡山当即表示了赞同。但为避讳“抗日”一词,阎锡山遂改用“牺牲”一词来代替,因而就给这个行将问世的群众组织定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到九一八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牺盟会”在海子边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宣告成立,并发布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宣言》和《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纲领》及《山西牺牲救国宣传大会告各界同胞书》。

二、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当历史走进1936年5月以后,也就是红军东征山西的战役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把阎锡山当做有可能成为

“抗日同盟军”加以争取，改变了对阎锡山的策略方针，由原来的军事战略进攻转化为政治战略攻势，采取一系列重大步骤，多渠道、多形式地加紧了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推动阎锡山终于转向“联共抗日”的道路，开创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

（一）党的英明决策和阎锡山转向“联共抗日”

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人，一项很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要依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新特点，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反革命营垒的矛盾变化，随时了解敌人，分析敌人，及时提出对付和征服敌人的正确方针与办法，同他们中间的一切愿意抗日的分子结成联盟（哪怕是暂时的也好）。遵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根据急剧变化着的客观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红军东征后阎锡山的政治态度有可能发生某种变化的现实性，进行了科学的阶级分析，把握了他的本质和弱点，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改变了对阎锡山的敌对态度，由军事战略进攻转向政治战略进攻，加紧了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积极促进他能够迅速地从“降日”到“抗日”、从“反共”到“联共”的矛盾转化。在此期间，共产党除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公开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和给阎锡山写《专函》外，毛泽东还数次亲笔致书阎锡山，磋商共赴国难，团结抗战之大业。刘少奇主持领导的中共北方局亦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通过各种关系、

利用各种渠道,积极地推动着阎锡山的转化工作。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一片诚心,不能不使在军事上触了霉头、政治上痛受打击的阎锡山为之震惊而有所醒悟。由是,阎锡山专门召集他的核心组织“自强救国同志会”的干部委员开会,围绕“降日反共”还是“联共抗日”的中心议题讨论表态。并令其心腹梁化之赴津邀请朱蕴山先生“第二次赴晋与阎锡山谈判联共抗日问题”。这些情况表明,不管阎锡山出于什么考虑,但可以肯定,在他的思想上却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某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变化。1936年8月间,正值共产党推动阎锡山的转化工作富有成效地长足进展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和指挥伪蒙军轰响了进攻绥远东北部的炮声,开始把侵略的魔爪伸到了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来。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庐山真面目也大大暴露:不仅指令他援助阎锡山拦阻东征红军的部队赖在山西不走,而且派遣大批特务钻入阎锡山的各种机构进行活动,甚至利用山西内部的派系矛盾,收买阎锡山手下的军政要员,策动所谓“河东道独立”,企图挤垮阎锡山,霸占山西这块地盘。日、蒋的这种内外夹击,对于阎锡山来说,不能不是重重的当头两棒。因为这时候的阎锡山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封建军阀,而且还是一个转向了官僚资本的百万富翁。他所经营的实业,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有工厂、铁路、银号、商场,总计拥有资本在2.2亿以上,控制着整个山西的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这笔庞大的资产,无疑是阎锡山的命根子。因此,如何解脱临头大难,怎样才能求得安身立命,就成为阎锡山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来自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是“拉”,是团结抗战,驱

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来自日本人方面的是“打”，是野蛮侵略，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来自蒋介石方面的则是“挤”，是排除异己，吞并山西这块地盘。三种力量，三种做法，三种结果，极其尖锐而猛烈地冲击着阎锡山。怎么办？是“联共抗日”，还是“降日反共”？是“联共拒蒋”，还是“迎蒋反共”？所有这一系列关系阎锡山前途命运的大问题，骤然把矛盾重重的阎锡山推向了戏剧性的高潮。如果说，在此之前还是“降日”与“抗日”、“联共”与“反共”、“迎蒋”与“拒蒋”同时向阎锡山“敲门”的话，那么，这时的阎锡山便是打开门来主动躬请何者“做客”了。其实，阎锡山在同共产党、日本人、蒋介石这三种力量的角逐中，特别是从这三种力量的不同做法中，已经在他脑子里逐步形成了相互依存、密切联系的三个概念：一是“今后中国人民的选择，看谁抗战有功”；二是“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三是“作头等好事的人，只能团结头等好人。作二等好事的人，可以团结二等好人。作坏事的人，则只能团结坏人”。第一个概念表明阎锡山要“抗日”，第二个概念表明阎锡山要“联共”。这就产生了“联共抗日”的主张。然而，这个“联共抗日”的主张，又是建立在第三个概念之上的。在阎锡山看来，共产党是做头等好事的人，蒋介石是做坏事的人，惟独他自己是做二等好事的中间人。所以，共产党团结的好人和蒋介石团结的坏人都只能是少数，谁也成不了气候，而只有他自己能够团结多数人，才有稳操胜券和成功的把握。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一贯善于识别政治风向和适应政治气候的阎锡山，终于从权衡利害的圈子中暂时走

了出来,由“降日”变成“抗日”,由“反共”变为“联共”,由“迎蒋”变为“拒蒋”,提出了“守土抗战”的方针,确定了“联共抗日”的新政策。共产党的英明决策,推动阎锡山转向“联共抗日”,这就为我党同阎锡山实行“合作”,建立特殊形式的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

(二)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然而,阎锡山“联共抗日”的这个意图不是公开地向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声明的,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即通过个人关系向我们的共产党员表明的。他决计“邀请”薄一波以非共产党的正式代表身份,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1936年8月下旬,阎锡山派郭挺一到北平狱中看薄一波,就是专为此事而来的。刘少奇指出:“山西的阎锡山在绥远事变后,看到敌人要侵占山西的严重性,决定了‘守土抗战’的方针。因为他要抗战,他就需要人民的帮助,就需要采用许多进步的办法与任用许多坚决抗日而有能力的人才。这就形成了他下面的一派势,即山西的新派。”阎锡山之所以采取这种特殊的方式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二的哲学”即“唯中哲学”在新形势下的继续运用。长期以来,阎锡山凭借他的这种最高哲学信仰,形成了一整套维持其反革命权力的“统治术”。这种“统治术”的特点是:看风使舵,随机应变,遇什么形势,就用什么人,用之好话说尽,弃则坏事做绝。换言之,只要能达到他“一切为了存在”、“在存在中求生存”的目的,阎锡山是会不择手段,使出任何绝招的。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从倒蒋大战至“建设救国”,20多年间,一脉相承,无一例外。所谓“左手提着同志头,右手换取一等侯”,

正是对阎锡山这种“统治术”的绝妙揭露。因之，他手下的人简直如走马灯一样，今天重用这个，明天又培植那个，一个个受青睐，又一个个被踢开，而他却在帮手们的瞬息消逝中“存在”下来，牢固地掌握着统治权力。如今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阎锡山依然玩弄这种权术，企图“在旧的反动的一只脚外，又树立起一只新的革命的脚步”。阎锡山深深懂得，这次同共产党合作，绝非他同部下的那种“主人”与“仆人”的关系，而是一种阶级对阶级的关系。但是，阎锡山对这种阶级关系讳莫如深，极力加以掩盖，挖空心思在表面上大做文章，企图用“主从”关系的方式取代“阶级合作”关系的方式。他以为通过个人关系，薄一波就不能代表共产党，就不能和他平起平坐，而只能做他的一个部下。从而，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利用“新的革命的脚步”来支撑其退步，支撑其反动；又运用“旧的反动的一只脚”以牵制进步，牵制革命。在他需要借助共产党的时候，就“请”薄一波回山西来帮他的忙，为他“组织一个新的能抗战的力量”；而当这一目的达到之后，他又可以随心所欲，或者一脚踢开，或者置之于死地。于是，一系列极其尖锐的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接受不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去不去山西？怎样去？去了以后又怎么办？面对这一重要的然而又是极其复杂的紧急情况，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北方局正确地、及时地规定了前进的方向，成功地回答了这一系列棘手的难题。

诚然，正确解决这一系列异乎寻常的问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通过克服来自“左”倾关门主义的思想影响实现的。一开始，由于薄一波“对阎锡山这个人不感兴趣”，便

婉言回绝了阎锡山的“邀请”。过后不久，刘少奇通过徐冰得知此事后，就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锐眼光，当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利于抗战的重大政治动向。他在对阎锡山进行了透彻的阶级分析之后，便果断地做出了和阎锡山建立“统战关系”的正确决策。他指出：“阎锡山是封建性很重的统治者，由于敌人对山西的进攻，他需要‘守土抗战’，他在抗战中需要实行一些进步的办法，目的是保持他对山西的统治。因此，他的进步是有限的，是暂时的。但是他能抗战与实行进步的办法，是好的，对革命是有利的，我们应援助他抗战。”据此，刘少奇指派徐冰迅速转告薄一波。徐冰告诉薄一波：“胡服（刘少奇的化名——引者）讲了，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在动摇中。当前党的任务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一致抗日。北方局刚刚收到陕北来电，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提出，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军政负责人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这样的机会我们找还找不到，现在阎锡山找上门来，你却拒绝不去，是不是还有一点‘左’倾关门主义的顽疾？‘左’倾关门主义就是不懂得要善于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相联系，把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相联系。过去我们就是吃了‘左’倾关门主义的亏，使白区党的工作受到重大的损失。”在这里，刘少奇阐明了党的政治任务和策略方针，指出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讲清了与阎锡山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可是，薄一波请求徐冰再次报告刘少奇，说：

“……我不去山西有自己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我做党的秘密工作已经多年了,不熟悉上层社会的人情世故和待人接物,不适合到那里工作。主要是不愿意和阎锡山这样的人共事,何况郭挺一已经知道我仍是共产党员。”对此,刘少奇给予了严厉批评,坚定地指出:“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彻底转变我们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和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这是新形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不会就学,到工作中去学。阎锡山正因为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才会对你这样欢迎嘛。”

为着了解和把握山西形势,确定今后的行动方略,经刘少奇同意后,薄一波于1936年9月由北平到太原,先行做了40天左右的实地考察工作。他通过深入考察,认为“山西确已形成可以推动阎锡山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有利形势”。随后,薄一波又回到北平,通过徐冰向中共北方局做了“包括山西的政治、经济情况,阎锡山的处境和他的思想动态、政治企图,对我们今后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建立统一战线可能性的估计,以及应采取的工作方式等”内容的详细报告。中共北方局批准了这个报告,并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即除薄一波外,再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和周仲英4人,第一批赴晋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临行前,又通过徐冰传达了中共北方局的三条指示:①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跟。不要搞“左”倾关门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和戴“官办团体”的帽子。②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

做“清客”，不“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③由薄一波、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 5 同志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后又增加到 16 人），只做公开工作、合法工作。这个组织绝对秘密，不对外。可开会，也可不开，因为阎锡山请的是薄一波，实际上就是通过薄一波的名义来进行工作。公开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北方局领导。同时成立中共山西省临时委员会，由张友清任书记。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这三条指示，是中共北方局对大力肃清华北党组织内严重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与空谈主义错误的斗争经验总结，为开展山西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方法。

遵照中共北方局的部署与指示，薄一波等赴晋工作以后，首先同阎锡山进行了一次重要会谈。这次会谈是由薄一波一人出面的。在会谈中，薄一波明确地提出了“三条原则”，即“约法三章”，并且得到了阎锡山的同意：“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是定型了，说话办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对抗日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要给予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其中会有不少是共产党人。”这次会谈的举行，在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既是共产党同阎锡山“统战关系”正式建立的开始，也是阎锡山“下面的一派势力，即山西的新派”胜利诞生的起点。而“约法三章”的提出和议定，使山西的新派在一开始就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取得了牵制阎锡山和打击反共顽固派的“合法依据”，为推动和发展山西抗